

利玛窦墓地的历史变迁与 中西文化交流意义^①

张祖群^{1,2}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101)

摘要:以利玛窦陵园碑刻文献考察为起点,通过对相关书面文献的核查,追述利玛窦来华的过程并阐述“利玛窦经验”,分析利玛窦墓地的文化变迁,总结利玛窦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最后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利玛窦以他个人和群体的努力,开启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质交流。第二,利玛窦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实现了互动双向的输入与输出。第三,今日之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重拾“利玛窦经验”和“利、徐之交”的“温和主义”路线,广揽人才,重温大国气度与开放情怀。

关键词:利玛窦;文化交流;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4-0018-07

2006年编纂的《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中,对于利玛窦墓的记载是“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436}。那片陵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门口还有2只蹲着的精美狮子,旁边立着一个水泥碑铭: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墓。这篇文章里以利玛窦陵园碑刻文献考察为起点,通过对相关书面文献的核查,追述利玛窦来华的过程并阐述“利玛窦经验”,分析利玛窦墓地的文化变迁,最后总结利玛窦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利玛窦来华与“利玛窦经验”

一个神奇的宗教人物,400多年前利玛窦是怎样来华的呢?后来在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陵园中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文写到:

收稿日期:2013-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12CJY088);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北京文化遗产的教育发掘与实施途径研究”(CGA12100);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12JGB117);2012年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基于文化空间因子的北京遗产旅游管理”(2012SKL027)

作者简介:张祖群,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与遗产旅游研究。

①2010级旅游管理专业邓阳同学对文章进行校对,特此感谢。

利先生讳玛竇,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明朝政府在中晚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西方自15世纪以来一直想通过传教士打开泱泱中华的大门。最初想要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公元1506—1552年),但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他最终没有实现入华传教的愿望,于1552年12月3日抱憾客死在距广东海岸仅56公里的上川孤岛。之后的30余年里,西方的传教士从未间断过努力。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2位耶稣会士,22位方济各会士,2位奥斯汀会士和1位多明我会士试图入华传教,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2]。欧阳哲生先生统计17世纪以来北京传教的耶稣会士为76人,许多人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3]。前人的尸骨是后人最好的向标和前进方向。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非常向往东方的神奇国度——中国。他先来到印度,在那里停留了4年,学习机械制造和印刷工艺。利玛窦学习的以小型、有弹性、带钢卷绕式的发条驱动部件的钟表制造和修理技术,是欧洲16世纪七八十年代技术革新的产物。这种实用技术的掌握,为他后来利用钟表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提供了方便^[4]。1582年他经过印度洋、南中国海,从我国东南沿海来华。

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利玛窦遭遇的南昌传教风波实际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这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这使其明白只有将天主教的教义以儒家文化的形式提出,在中国大地上广交朋友,同时结交上层,争取到皇亲贵族的顶力支持,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冬,利玛窦觐见明朝宗室建安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用汉文撰写了名著《交友论》。他觉得给建安王送金银财宝以及稀罕之物,不如献上自己的交友主张。此时的利玛窦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0年,深得中国文人的交友之道。因此,他要投其所好,闭口不谈宗教,而是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交友,深得当时士大夫的赞赏^[5]。觐见明朝宗室建安王是利玛窦与明朝的中上层官员和皇亲贵族交往的重要一步。他用西圣言语荟萃同时充满着西方启蒙时代的博爱思想的《交友论》,兼又依照中国儒家观念,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理,在相对封闭的中国,首度敲开了隔绝已久的中世纪东西方文化深入交往的大门。要知道,这距离唐代通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已经过去七八百年了。

明万历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他历经艰难险阻曲折来到北京,向明神宗进献自鸣钟、《天主母像》等礼物,并亲自为皇帝演奏古钢琴曲《西琴曲意》,此举颇受皇帝赞赏,遂与之深交。在北京期间,他与朝廷官员广泛交往,并传播天主教,亦介绍西方启蒙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在当时并非所有的朝廷高官都认同利玛窦,有的官员对皇帝如此恩宠一个异教徒颇为不满,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是这样反驳他们的:自古来华之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6]。朝廷中叶向高等人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正是在打消了各种疑虑,得到政治力量的广泛支持之后,1605年利玛窦创建了北京的第一座教堂——天主教北京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开启了天主教在北京广泛而曲折传播的先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走上层路线,主动改变基督教的传统服饰打扮,入乡随俗,正式蓄发,脱掉袈裟,换上儒服,遵从儒家礼仪,允许天主教教徒祭天敬祖。试想一下,在宋明理学禁锢下的当时,一个异教徒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光荣理想,光靠对宗教的虔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关键在于要因地制宜,找寻到天主教与儒教文化的契合点。利玛窦便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遵照文化交流的规律行事,他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学东渐。他根据自己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信仰天主教的因素,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可以在维持自己文化的同时,顺利接受西方文化^[2]。如同油墨漂浮于水中,只有融于其中,才能彻底使水变成油汤。这种理解、尊重和主动适应中国传统礼俗、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的“利玛窦经验”,值得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深入反思和重拾推广。特别是距离利玛窦时代不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从最初的天主教内部不同派别之争,演变为干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行为,个别传教士还参与皇太子争储和帝位纷争,最后遭到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走入低谷是必然。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

撤销教徒“不可以敬天祭祖”之命令,天主教在华传播才又有了几年的中兴^[7]。相比较而言,清朝初年即有“中国礼仪之争”,民国时期即有遵循传统还是进行新文化运动之争,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即有姓“资”还是姓“社”之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国情之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

二、利玛窦墓地的文化变迁

(一) 1610—1900年:利玛窦下葬于北京至义和团运动爆发前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月11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在北京溘然而逝,终年59岁,距离一个中国人的“花甲之寿”仅仅差一岁。经明神宗朱翊钧特许下诏开阜成门,1610年10月,利玛窦得“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即今天的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能够下葬于滕公栅栏官地,帝王之隆恩浩荡,可见一斑。当然朝廷为嘉奖这位传教有功之臣,同时也为嘉奖后来者,将明廷籍没的杨太监在滕公栅栏的寺院1座,官地20亩,房屋38间赐予利玛窦和此后的外国传教士为墓地,故而利玛窦墓碑左右两侧分别立有南怀仁、汤若望二外籍传教士的墓和碑。他们墓前之雕刻悉为罗马雕刻艺术形式,长眠于此的传教士们,是否还在想念着故乡?

明朝崇祯年间进士刘侗在1635年撰写的《帝京景物略》中对利玛窦的墓地作了精彩的描写:“今其徒,晷以识日,日以识务,书分不足,夜分取之,古之人爱日惜寸分,其然?墓前堂二重,俟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有铭焉,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①书中特别写道,在利玛窦墓地南面的二重院落之前,立有一架古代的记时器——石晷。石晷底座上刻有如下的铭文:“岁月如梭,已往者不能追回,未来者也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奉劝大家要珍惜现在的时日,多行善,勿做无益徒劳之事。”在一个石盘上插根细铁棒,根据太阳不同角度的照射,铁棒的影子会移动。这架石晷为利玛窦亲手制作,是否为西方人仿制的第一架中国古代科技仪器,尚不可考。“石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对器物原理之热衷,死后仍然铭记。

最初的利玛窦墓,墓穴长方形,坐北朝南,幕后建有一西式拱顶六角亭,今亭早已焚毁。墓前原列有石供及明顺天府伊王应麟撰书的石碑一通。此碑已毁,现在的碑推测可能为庚子事件后清人重立。整个墓地以砖墙围绕,南门外有一石墁甬道,墓前立有石门牌坊一座,大书“钦赐”二字,从明朝皇家钦赐到清朝因袭的荣耀一直遗留至今。校园里访得一老人,称之为“石门墓地”。此后,由明及清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神甫、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相继葬于此墓地中。至清朝末年,滕公栅栏已逐渐发展壮大成了一处以利玛窦墓地为核心,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知名的天主教教会产业集群,实际上是北京旧城一个天主教中心。

(二) 1900—1949年:义和团运动捣毁利玛窦墓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00年,发源于直隶、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城,利玛窦墓及附近教堂在“扶清灭洋”的盲目排外运动中全部被夷为平地。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以赔款通商惩治拳匪,签订《辛丑条约》而平息事态,诸国列强稍息。在这种情形之下,三年之后的1903年,清廷重新拿出白银1万两重修了滕公栅栏墓地,这在碑文里有详细记载。并且将利玛窦与汤若望,南怀仁等部分外国传教士墓一起在旧址重建,在墓园的南边修建了一个大教堂。但其陵园地上建筑与各墓排列已非原貌。墓中亦无遗骸入葬,系衣冠冢。其他许多散乱墓碑,则被砌在新建教堂的墙内。

(三) 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党政机关直接利用原来民国时期的古建遗迹,该墓地被划入北京市委党校管理。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老同志回忆,当时,有关人员为此请示了国务院宗教事务

^①[明]刘侗、於弈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五·西城外·利玛窦坟”,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版(根据1963年本重印),第207-208页。

管理处,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则直接请示了国务院。最终,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的墓地仍在原址保留,而其他传教士的遗骨及墓碑则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乡新辟的16亩墓地内^[6]。1958年,北京市在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对利玛窦墓地做了详细的普查记录,登记造册。直至1966年以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的墓地,还是北京市文物局管理的受保护文物。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又兴起了盲目的排外仇外运动,利玛窦墓与附近诸传教士墓又被夷平,教堂被一一拆除。如果按照符号可以分解为能指和所指两个内在结构来理解,“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8]符号的所指有直接所指和含蓄所指之分,能指也有不断元语言化的倾向;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则可发生复杂转换^[9]。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推倒的不仅仅是利玛窦墓碑实体-能指,更是一个文化侵略的西方符号。几位有良知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工作人员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地下,墓碑就这样被偷偷地保护起来了。他们保护的何止是墓碑,更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种子和人类的良知,利玛窦墓碑的“所指”仍然唤醒了部分人的良知。原来砌在教堂墙内的其他墓碑等遗物被弃置于地,破烂不堪,陵园中杂草丛生。

(四)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松动,中国开始重视文物遗迹的保护,深埋地下的利玛窦墓碑重见天日。1978年9月,中国政府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先生率团赴意大利参加一个会议时,意方与会代表多次提到了利玛窦,对已被平毁的利玛窦墓地深感担忧,并转达了时任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科隆博先生的一个愿望:由意方用大理石镌刻一尊新碑,赠送给中国,希望能够在原处重新树立起来,以表达对这位曾对意中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先哲的纪念。许涤新回国后,立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上述情况,并且建议对被毁坏的利玛窦坟墓加以修复,保存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史迹。胡乔木阅后,表示同意,并随即上报给主管领导李先念副主席。后经过中国高层领导人亲自审批,历时一年,耗资一万元,原被深埋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外国传教士的墓碑被挖出,并在原处基础上以原样修复完毕。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地再一次重新树立起曾经被这个民族推到的丰碑!

1984年,北京市政府将利玛窦及明清以后外国传教士墓地,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北京市委党校出资扩建并重修了该墓地。这也是《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对其记载的规格。该志详细记载了这次重修后的格局:

(墓园)坐北朝南,东西毗连的两个墓院,四周皆以砖砌花墙围绕,东园南北长25.70米。东西宽15.50米,为利类思等60位明清传教士墓碑碑林。西院较之东院向北缩进15米,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传教士的墓院。其中利玛窦墓居中,汤若望与南怀仁墓分列右,左两侧。三墓均为前碑后冢格局。

重修的利玛窦墓,坐北朝南,墓高1.50米,长2.40米,宽1.30米。墓前列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其碑为螭首方座式,碑高2.70米,宽0.94米,碑座高0.60米,宽1.20米。碑后约1米是墓冢^{[1]436}。

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辟一院,将1900年以后嵌在原马尾沟教堂外墙,后来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倒塌之后,重又树立起来。

1992年,西城区文化局将位于党校南墙的原教堂的小石门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这样,原“滕公栅栏”墓地遗存的文物就基本上都得到了修复和保护。2001年,由澳门文化署以英、中、葡三种文字陆续出版《“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一书^①,梳理了近七十年来在这块既是死者长眠之地,也是生者积极活动场所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2006年,国务院将“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

^①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虽逝犹存: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年由澳门文化署以英、中、葡三种文字陆续出版。该书采用大量史料图片,大16开,厚铜版纸精印。

地”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序号:222,编号:Ⅱ-2,时代:明至清,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这是国家层面上对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的首肯,是从民间自发到国家意志的文化觉醒。2010年北京行政学院编写并印制了大开本的中、英文画册——《青石存史:“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10]。该书除前言、附录和后记之外,主要由9章构成,分别介绍了安葬在原栅栏墓地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其他外国传教士在“历局”、“钦天监”、地图测绘、宫廷服务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扼要梳理了墓地四百年来的风风雨雨,重点介绍了1978年以来墓地重建的过程及其重要意义。是编制《历史遗迹: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和《利玛窦在中国》光盘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成果。

截止今日,“明清传教士墓地”共保留63名传教士的墓碑,集中了明清传教士沟通东西方之间的典型记忆。笔者调研得知,14人来自葡萄牙,11人来自意大利,6人来自德国,9人来自法国,还有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这些人中包括: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和参与“万园之园”圆明园设计的著名的画家郎世宁。

总之,在今天看来,修复一处古墓,树立一尊石碑,是何等寻常的小事。同时它也显示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宗教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利玛窦及明清传教士墓地与古观象台上的精美的天文仪器、几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及陈列在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法国传教士碑林等,一道成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青石无言,历史在这个角落诉说着古今风雨的天道沧桑,石碑作为一种石质文献遗产凝聚着风云变幻的历史变迁,见证着兴衰更迭的命运起伏。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不仅成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记录着中国明清民国王朝更替给民众带来的剧烈伤痛,更见证了共和国时期“破四旧”、打倒一切封建的惨痛教训,还表明了1978年以后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同时,它们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外国友人平等交往、友好相处的展示,也彰显了文化交往的成果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显著作用。

三、利玛窦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第一,利玛窦以他个人和群体的努力,开启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质交流。在利玛窦之前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西方古典哲学、逻辑、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天文、历法、地理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系始终无法同东方中国建立一种密切交流。两种文化体系之间始终未有实质性交流。利玛窦来华以后,改变了这一切。他通过讲授西方数学、天文学知识及制作各种新奇的科学仪器,赢得了“托勒密第二”、“万能博士”、“欧洲绝顶聪慧之人”的美誉,他率领学生制造的各种科学仪器以及西式地图,深受中国民众和官员的喜爱^[4]。现在举三例:第一,合译《几何原本》。其中以他与当时的科技之星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他与工部李之藻合编的《坤輿外国全图》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广为人颂。《几何原本》首次向东方介绍了古希腊的数学成就,为开启西学数理明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合编《坤輿外国全图》。《坤輿外国全图》是中西文化折中的产物,通过使用西方的绘图技术,对日月星辰的华美装饰,以及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将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花卉之乡”的表现方式,十分明显地展现出当时大明王朝自视为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心态。第三,开辟了油画传入中国的有效途径。承接罗明坚、乔瓦尼等传教士,利玛窦对西方油画在中国传播居功至伟。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开辟了油画传入中国的有效途径,对推进油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和传承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详细记录了利玛窦介绍西洋画的基本知识,分析了在不同光线照射下,产生明暗立体的现象,解释了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和造型技巧。利玛窦虽然不是一位专业画家,但是他给中国人上的第一堂西洋画法启蒙教育课,无疑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1]。

400多年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政治、科技、外交、军事等交往加深,东西方同时认识到利玛窦的纽带价值和桥梁作用。可以这么说,他是中世纪历史与文化嫁接的先驱者,首次将东方和西方、中华古

典的儒家理学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化,首次将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连接起来。利玛窦,他是第一位把欧洲近代文明慷慨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人,也是最早学习中国《尚书》、《周易》等经典著作并认真钻研中国典籍的西方人。他巧妙地借助儒家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他是一个集司铎(天主教神甫的正式品位职称)与学者、天主教徒与汉学家、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多重身份于一体,且又能巧妙、和谐地将其融合在一起的令人惊叹的传奇人物。这是他个人的努力,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群体努力之结果。

第二,利玛窦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实现了互动双向的输入与输出。17世纪陆续来到北京的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安文思、李明等人撰写的著作构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西方人眼中的北京画像(表1),这是典型的西方人看东方,是最早的东方学原型,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3]。

表1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传教士	著作	意义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	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
安文思	《中国新史》	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注:根据文献^[3]整理制表。

利玛窦撰写的“儒家化”的基督教《天主实义》是他在中国基督宗教史上影响至深的要理问答性著作。在文中他详细论证了天主是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灵魂不朽,宣讲人当趋善避恶、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以及不整全的基督论(天主降生成人),并且诉诸儒家典籍和自然理性^[12]。面对两种异质文化的激烈碰撞,他最终把天主教中的“天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划上了等号,从而扫清了国人在观念上、文化上信仰天主教的障碍,为天主教的在华广泛传播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为将中国文化输出到西方,促进西方启蒙思想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同时,西方科技为明朝“实学派”所继承发展,西学逐渐东渐,这种“西方血液”也为中国实学在清代晚期西方列强的打压中被迫发展“洋务”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利玛窦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经过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客观上形成了17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中国人从欧洲进口“科学技术”,欧洲人则从中国输入儒家的“人文精神”^[13]。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规范传播,为西方所认知,促进更深层次的文化启蒙,东学西渐,利玛窦同样功不可没。东方和西方首次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文化交易平台上形成了互动双向输入与输出。从这种意义上说,16世纪的西方文化、东方儒学绝非传统意义上高势能向低势能的单向传播^[14],也可以将他们看成同样势能的均势文化。

第三,今日之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重拾“利玛窦经验”和“利、徐之交”的“温和主义”路线,广揽人才,重温大国气度与开放情怀。“利、徐之交”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而后清朝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闭关锁国”则是文化交流公认的失败模式。当今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多多思考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启的“温和主义”路线,重温大国气度与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走向崛起、复兴之路和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中,才不会让他国产生误解,对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15]。诚如《中国民族报》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专刊上一篇文章里阐述的那样:今天的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首先就要打造吸引世界级人才的宜居环境。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力与创造性,是吸引利玛窦这样的世界级人才的最重要条件^[16]。400年前封建社会的大明王朝姑且能够吸引和包容利玛窦,广揽人才,遑论今日开放之中国?需深谙,只有吸引和留住全世界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最优秀人才,能在北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使得

北京为全世界才俊所向往,那样才会建成真正的世界城市!我们的首都,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征途中,道路还有多远?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和科学的部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从而增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觉性;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们可以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友好相处、平等交往的各国文化使者的肯定与友情,可以展示当前中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项开明政策。400年前,利玛窦等一批友好的外国人,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共同架设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利玛窦墓地在历史与现状之间形成一种文化悖论^[17],今天我们纪念他,将把这座桥梁建设的更为平坦和宽广。

参考文献:

- [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436.
- [2]疏仁华.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6).
- [3]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J].历史研究,2011(3).
- [4]谢贵安.利玛窦:全才工匠师[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8).
- [5]包光潜.利玛窦与《交友论》[N].中国民族报,2010-01-19(07).
- [6]余三乐.利玛窦墓地:历经沧桑数百年[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7).
- [7]傅临祥.交流与交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62.
- [8]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134.
- [9]章建刚.遗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理想模式[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 [10]北京行政学院.青石存史-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四百年沧桑[M].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 [11]徐新.圣母像叩开中国画坛之门[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8).
- [12]孙尚扬.利玛窦与汉语神学[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6).
- [13]马丽.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西洋使者[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8).
- [14]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36-537.
- [15]陈琳,回望利,徐之交.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7).
- [16]本报记者.利玛窦与世界城市北京[N].中国民族报,2010-05-11(06).
- [17]张祖群,邓阳.在历史与现状之间:试论利玛窦墓地的文化悖论[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2(9).

On Historical Changes of Mateo Ricci Graveyard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ZHANG Zu-qun^{1,2}

-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aking Ricci cemetery inscriptions on the literature study as a starting point, referring to a written ver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author traces the course of Mateo Ricci in China and “Ricci Experience”, analyzes he cultural changes cemetery Ricci, Mateo Ricci in the final summary of the symbols of cultural exchange significance. Enlightenmen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first, the Ricci with his individual and group efforts opened up the real exchange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econd, Ricci introduced the world to China, but also China to the world, achieving a two-way interactive output and input; third, today’s China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should regain the Ricci’s exper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Xu turn”, “moderatist” lines, recruit various talents, Wenda Guo, and reexperience the demeanour as a great power.

Key words: Mateo Ricci; cultural exchange; semiotic; historical changes

(责任编辑 彭何芬)